

城市生活垃圾去哪儿了？

一鸣

近日，耳闻两则新闻。一则是新华社消息，全国不少地方的垃圾填埋场被整治，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北上广深等城市不再接受原生垃圾的填埋场。最典型的是深圳罗湖区玉龙镇垃圾填埋场，垃圾量达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110米。从2004年开始实施整治，目前垃圾已被清理，“垃圾山”已经抹平。修复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可释放30万平方米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百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据2026年5月27日新华社电）。

另一则是“路边社”消息，有朋友说，某县级市投资新建了一个垃圾填埋场，建成后无垃圾可埋，无法开业，只好空着，为民办事实事没办成，还造成了经济损失。

城市生活垃圾，曾是困扰城市治理者的一大难题。在以往的岁月里，有过“垃圾围城”，老百姓怨声载道；有过垃圾堆放场臭气熏天，污染严重，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有过垃圾场引发选址何处的无休止争论，当地领导不愿意把垃圾

场建在自己的辖区，周边村民更是极力反对——为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妥善处理，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不惜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如对周边群众给予适当的补偿，如把露天垃圾堆放场改为填埋，如选址新建垃圾填埋场，从近郊迁往边远，等等。然而，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人人都在产生垃圾，人人都不希望垃圾堆放在身边。

不曾想，困扰多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难不再是问题。原有的“垃圾山”在一座座消失，新建的垃圾填埋场无垃圾可埋。时间改变了，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按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生活的提高，电商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垃圾不会减少，只会增多。那么，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去哪儿了呢？

垃圾分类的提倡与推广，使部分生活垃圾直接成为可用资源。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等4类，并在社区落实专门人员从事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得到广大居民的

响应，成为居民的自觉行为，从而使部分垃圾不再进入城市生活垃圾的转运处置环节，从源头减少了垃圾量。本报曾组织“说说垃圾分类那些事”系列评论，为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鼓与呼。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兴起，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最大去处。2010年垃圾焚烧技术起步，全国建成百余座垃圾焚烧厂，那时处理能力不足10万吨/日，80%的城市生活垃圾还是依靠填埋。如今，垃圾焚烧厂覆盖全国城市和县区，已达一千余座，处理能力115万吨/日。焚烧厂的平均负荷不足80%，产生的生活垃圾填不满焚烧厂的“胃”。一些地方开挖过去的垃圾填埋场，为焚烧厂寻找垃圾源。我市的情况大致亦如此，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厂7家，处理生活垃圾能力达9000吨/日，而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6000吨/日。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过程中容易产生的有害气体得到有效解决，焚烧厂成为当地环保合规、环境优美的工厂。

政策倾斜，成为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难题的重要推动力。早在2012年，国家确定全国统一的垃

圾发电标杆电价，280千瓦时以内每千瓦时0.65元。这一补贴政策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极大地推动了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此外，地方政府也提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补贴，每吨50元至150元不等，以保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适当利润。

城市生活垃圾不再是废物和负担，而是成了资源、成了财富。如用垃圾发电，用焚烧后的废渣制造建材，这确是一起令人欣喜的好事。这让人相信，只要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特别是农村、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工作能做得更好，“垃圾山”必将难再重现。从城市生活垃圾不再是问题联想到，社会生活中曾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难题，如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住房难、养老难、就业难等等，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只要待以时日，也一定能够解决。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匡吉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在新征程上奔跑，不是每一棒都能闪光，但每一棒都在铺路。“铺路”与“闪光”，读懂了这两个动作的关系，就读懂了这一代青年该有的样子。

历史的“铺路者”，当时无人喝彩。百年前的那群青年，上船的时候没人想自己是铺路还是闪光。邓恩铭、何叔衡牺牲时，也没人知道他们是铺路石。但路，就这么铺出来了。今天的路，因他们而存在。“闪光”是后人的追认，“铺路”是先人的自觉。这种自觉，就是理想本身。

上甘岭战役中，坑道里的战士们啃着冻土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不会被记住，只知道阵地不能丢。后来，阵地守住了，旗帜插上了，但那些“铺路”的身影，大多化作了无名墓碑上的数字。没有铺路的沉默，就没有闪光的荣耀。

当下的“铺路焦虑”，源于“即时反馈”的幻觉。

短视频时代，“闪光”被重新定义。点赞“10万+”是闪光，“热搜第一”是闪光，但这些都“闪光”不需要“铺路”，只需要算法。真正的“铺路”，是三年磨一剑、十年冷板凳，是没有反馈时的坚持、坚守和坚定。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六十五年扎根田间深耕农技，一生默默铺就农民致富路；王昌深藏卫国战功四十多年，在平凡岗位坚守一生；被追授“七一勋章”的陈俊武，七十载深耕石油石化科研，打破西方技术垄断，为国家能源事业奠基铺路。他们

用漫长坚守为国为民铺路，不奢求即时闪光。

当代青年不是不想铺路，怕的是“铺了路、无人知、无回报”。这种焦虑，不是理想缺失，是理想的“兑现周期”被压缩了。“即时满足”固然出于人之常情，但“延迟满足”才贴近理想的本质。

铺路与闪光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别让“只想闪光”委屈了青年，也别让“只能铺路”委屈了青年。作为青年个人，不能把青春当流量赛道跑。跑道再宽，跑偏了也是白跑；路还没铺一寸，就先忙着拍跑步姿势，这样能跑得了一时、却跑不了长远。作为各级组织，对青年既要压担子也要给舞台；否则，青年不但路铺不动，光也闪不出来。

其实，“铺路”本身，就是“闪光”的一种形态。

黄文秀北师大硕士毕业，毅然返乡扎根基层、深耕扶贫一线，将最美年华奉献给乡村振兴。倘若岁月静好、平凡坚守，她或许只是万千基层干部中默默耕耘的一员，不被聚焦、不被熟知。但她的“闪光”，不在报道里，而在她选择回去的那一刻，理想闪光，不是“被看见”，而是内心笃定的自我坚守和价值确认。

每一代青年，都是铺路与闪光的接力者。

105年前，那群青年在嘉兴南湖的船上，不知道自己在“铺路”还是在“闪光”。他们只知道，船要往前开。今天，我们的船还在往前开。这一棒新的起点，是“十五五”蓝图铺开的当口，是科技突围、乡村振兴、强军建设的当口，每一寸路基都等着我们去铺。铺的时候听不见掌声和喝彩，只听得见沙沙的声响；等交棒那一刻回头看，路基上全是闪光的碎屑。

用青春铺路的人，不必等理想闪光。铺路的身影，就是理想本身在发光。

谷文昌“不用木制家具”与汪洋湖“十二年不吃鱼”



易其洋

看今年第7期《新华文摘》，读到《谷文昌：群众口碑相传的“好书记”》一文，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期间，谷文昌为节省木材，保护森林资源，提议家里不用木制家具，而用生长期较短的藤制家具。对于女儿因结婚而申请特批木材做家具的请求，他严词拒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

年大会上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汪洋湖，在担任吉林省水利厅厅长期间，从不吃鱼，这个习惯水利厅人人知道。但自从调到吉林省人大工作，一些新同事发现，汪洋湖是吃鱼的。对此，他的解释是：水利厅下面管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库，逢年过节了，这些单位就可能往家里送鱼，容易滋长不良作风。这个不吃鱼的习惯，汪洋湖保持了十二年，直到离开水利部门调往新的岗位（2013年9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

为啥要这样？道理很简单：上头喜欢啥，下头就会盯上啥。谷文昌提议家里不用木制家具，就是怕自己成为坏榜样，下面看样学样，一个人带坏一方风气。当年，厦门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说过一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那些空谈“围猎”官员的人，往往不会硬碰硬，多是瞅准官员的爱好，处心积虑地投其所好。

汪洋湖任水利厅厅长，是“管鱼”的，如果别人都知道他爱吃鱼，送鱼的恐怕就会络绎不绝。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谷文昌和汪洋湖“高明”在哪里？高明在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权力，个人爱好就是软肋，就是投机者、“围猎”者下手的地方。一旦个人贪欲膨胀，玩弄权术，以“爱好”示人，那就是“自腐”的开始。倘若谷文昌“靠林吃林”，如果汪洋湖“靠水吃水”，那就等于“城门洞开”，甘于被收买、被“围猎”了。

反腐，我们讲“三个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做到前两个“不”，靠制度、靠震慑。谷文昌“不用木制家具”，汪洋湖“十二年不吃鱼”，显然是“不想腐”，是最难的，那是廉洁念头在心里真正立住了。试想一下，谷文昌如果心疼女儿，松了一次口，破了一次例，特批木材做家具，之后还能立得端、行得正吗？愚。汪洋湖要是

觉得“收几条鱼，没啥”，那别人今天送鱼，明天送别的，他还能挡得住吗？难说。

其实，好多“落马官员”也不是一上来就坏的。刚为官时，也都挺注意，处处主动隐忍，事事自觉避嫌，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时间一长，权力一大，谄媚和奉承多了，警惕性就放松了，被人“温水煮青蛙”，终至于走上歧路，悔之晚矣。

共产党人，自然应该像谷文昌、汪洋湖那样洁身自好、如钢似铁，慎终如始、一以贯之。但党员干部也是人，难免为人情所牵绊，被欲望所驱使，稍有不慎，就可能“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同样要紧的是，扎牢制度的笼子，堵住“能腐”的漏洞，让谷文昌、汪洋湖那样的“不想腐”者守规矩守得轻松，让那些“想腐者”“敢腐者”就算再大胆、再狡猾，也钻不了空子，想腐、敢腐也腐不成，腐了也跑不掉。

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陈一帆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加，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

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

防溺水治理需分类施策，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地既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栏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

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漂流“十船七翻”：“包捞包活”≠包安全

丰收

7月5日起，一段“贵州洛北通天河漂流实拍”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中，一条搭载6名游客的红色皮划艇在河道中遭遇大浪，浪头高至游客头顶。急流过后，皮划艇倒扣，艇上人员悉数落水。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当天途经急流点位的十余皮划艇中有七条翻船。工作人员称，“无论游客岁数多大，都是包捞包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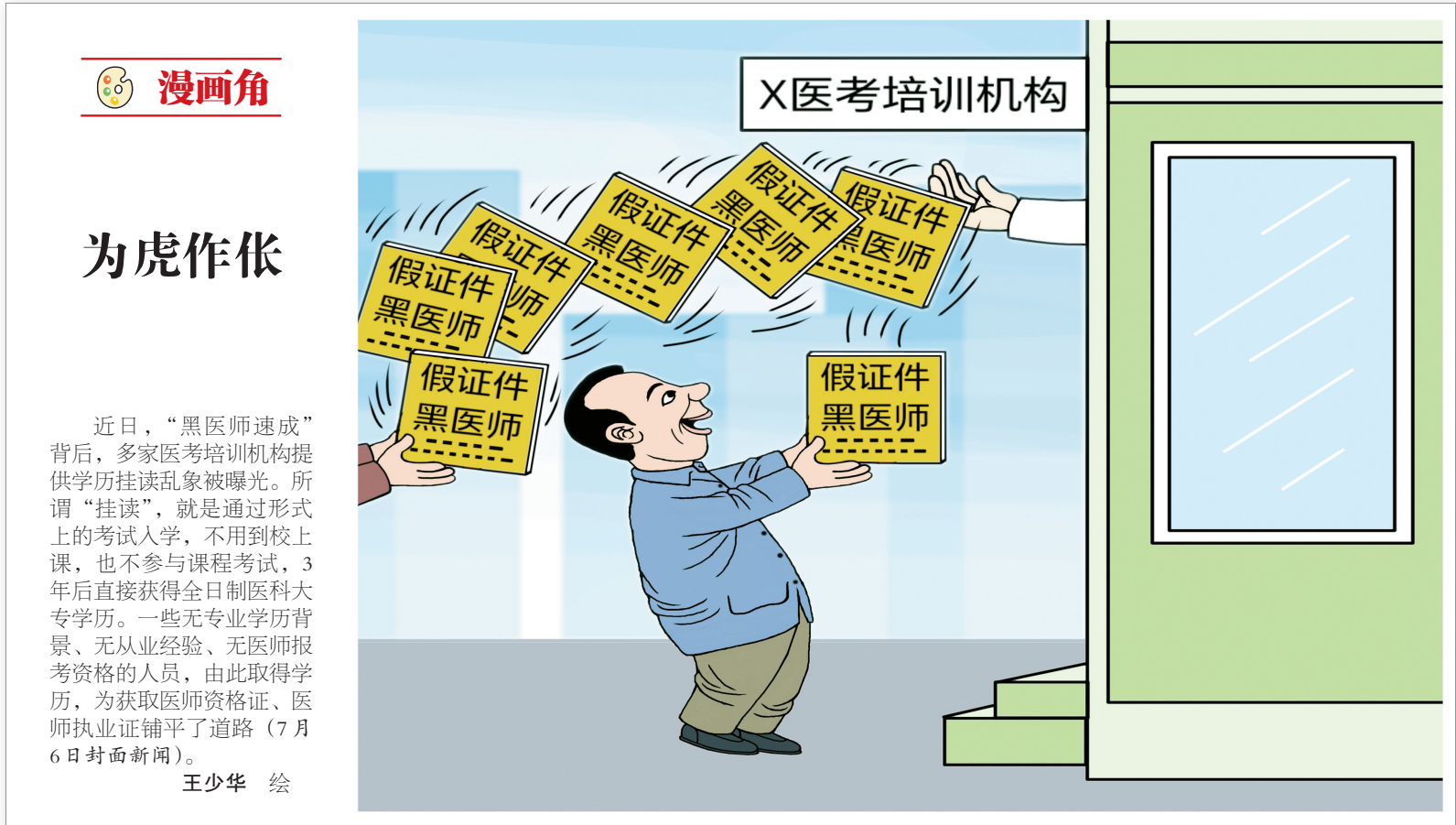
漂流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户外运动项目，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同时，它也是一种高风险项目，翻船、撞击、失温及极端天气引发的突发水患，都可能造成事故。从漂流项目“十船七翻”，可以看到上述景区对游客安全明显重视不够。

高翻船率就意味着高风险。景区之所以不惧风险，大概是因为有“包捞包活”的底气。

然而，某些危险情形可能超出想象，未必能真正做到“包捞包活”。即便做到“包捞包活”，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如果发生游客受撞击、溺水等情况，可能导致游客伤残，风险同样不可小觑。一旦发生悲剧，游客及其家庭难以承受，景区也要付出沉重代价。

根据《旅游法》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旅游安全管理条例》就此进一步做出了详细规定。反观上述景区，面对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风险，仍坚持漂流，没有发生事故只能说幸运。

“包捞包活”只是事后应急救援承诺，更重要的是采取措施预防翻船。希望该景区的运营者将“十船七翻”视为安全预警，及时查漏补缺，把游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解码“综合飞一次”背后的治理逻辑

郑建钢

7月2日下午，一架搭载高清变焦镜头的执法无人机从洋市河岸边缓缓升空。地面指挥屏幕上，河道水体及周边区域的实时高清影像清晰呈现。这是江北区综合执法局执法指导办牵头开展的“综合飞一次”巡检，以“天空之眼”织密全域立体监管网的生动实践。“综合飞一次”行动从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统筹组织12个部门开展联合巡飞专项行动8次，重点巡查点位121处，发现并闭环处置各类问题14起，推动现场检查频次下降68%，监管整体效率提升5倍以上

（7月7日《宁波晚报》）。

传统的人工地面执法，由于受到人力限制、地形阻隔、视线盲区、多头检查、重复执法等诸多困扰，存在巡查盲区多、覆盖面不足、效率偏低、部门分散监管、扰企扰民等深层次问题。在数字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重塑执法监管体系，推动执法监管迭代升级，织密全域立体化、智能化监管网络，势在必行。

“综合飞一次”巡检，把监管视角从地面提升到空中，打破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隔阂和行政壁垒问题14起，推动现场检查频次下降68%，监管整体效率提升5倍以上

而且是治理理念的升华，为执法监管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多部门建立统一调度的运行系统，根据统一的规范进行操作，各部门可以实时交流监管信息，及时协调巡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一起想办法商量应对措施，不但提高了相互之间的协调能力，也提升了执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与此同时，统一的规范操作，减少了入企业现场检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业和公众因为不同部门实施不同标准而感到困惑，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针对基层治理系统性、协同性不强的问题，只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体系优化、减负增效、科技赋能，就能精准破解基层治理中的痛点、堵点与难点，推动治理体系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

随着低空经济战略的深入推进，无人机技术正从单一的工具应用向系统化、协同化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体系转变。“综合飞一次”模式将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优化城市治理结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城市规划、应急管理、消防安全、森林防火、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